

宗白华的早期伦理哲学观：同情与忏悔

王冰冰 文学武^{*}

内容摘要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批评领域中，“同情”作为建构诗性正义社会的关键词而被频繁提出。而“同情”说早在中国五四时期便已被美学思想家宗白华所注意，它是宗白华救世模式的道德基础，也是宗白华生命艺术哲学的逻辑起点。宗白华坚信通过培养人们的同情力，便可以实现人的平等对话与向善的团结力，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发展的救世目标。本文从宗白华的“同情”伦理美学的缘起，“同情”说内涵以及宗白华“同情”说的现世意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宗白华的伦理哲学观是其整个生命艺术哲学的基础，贯穿始终。

关键词 宗白华 伦理哲学观 同情 忏悔 正义

近年来，西方一批政治哲学家如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1921—2002年）、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年）、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1921—）等，从政治伦理学的角度为建构正义社会提供了各自的试验路径，其中“同情”这一美学范畴与德性伦理、诗性正义紧密连接，体现出人文学科对于健全人性、完善人类整体发展的有效性。在中国，宗白华于五四时期便已提出，通过培养国民的“同情”力对建设新人格、改善社会现实的重要性，它不仅是宗白华救世哲学的道德基础，而且是贯穿其整个生命艺术哲学的逻辑起点。不同于当时其他团体的政治救国方略，宗白华坚信不必使用武力，从社会文化方面培养国民整体向上的精神情绪，便可以实

现主体间的人格平等与全体团结，从而达到建立美好新社会的救世目标，实现其救国、救民的政治理想。显然，这一路径是建基于人性基础之上的，属于比较温和的变革社会方式，在当代社会发展、相对稳定的大环境条件下，它对于建造一个充满正义的现代德性伦理社会是有借鉴意义的。

一、救世情怀：宗白华早期伦理哲学的缘起

在20世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各类救国、救民团体纷纷兴起。1918年6月30日，少年中国会在这种现实情境下应运而生，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仅度过了7个春秋，但它作为不同于其他团体的青年爱国组织，有着它自身的历史地位。少年中国会成立初期，宗白华积极参与学会的建设工作，尤其对青

^{*} 王冰冰，女，安徽临泉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15届博士生。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文学武，男，1968年生，河南省潢川县人。文学博士，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年的精神素质提出了要求。他认为改良社会现状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中国现在个个青年有奋斗精神与创造精神，联合这无数的个体精神汇成一个伟大的总体精神，这大精神有奋斗的意志，有创造的能力，打破世界上一切不平等的压制侵略，发展自体一切天赋，才能活动进化，不是旧中国的消极懒惰，也不是旧欧洲的暴力侵略，是适应新世界新文化的‘少年中国精神’”。在宗白华看来，只有从个体精神建设开始，才能整体上创造我们的新国魂。可是，现在社会上一般的平民，包括青年在内，几乎过的纯粹都是“一种机械的，物质的，肉的生活”，还感觉不到“精神生活，理想生活，超现实生活……的需要”。长此以往，不仅会阻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发展，一切精神文化，诸如艺术、学术、文学都将不能由平民的切实需要向上发生伟大的进展。而且这种不健全的人格将会侵蚀人性的感受能力，消损生命的张力，社会也将如死水一般，无生机可言。所以，宗白华认为，我们现在的责任，首先是要“替中国一般平民养成一种精神生活，理想生活的‘需要’，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以外，还希求一种超现实的生活，在物质生活以外，还希求一种精神生活。然后我们的文化运动才可以这个平民的‘需要’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前途”。同时，宗白华也强调，他们并不是用武力去改造社会，抑或是从政治上去创造新社会，而是要从个体小己新人格的创造开始，建设一个具有新精神的“少年中国”。

宗白华认为，由于人的个体意志的不同，面对

人生，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看法，有诗人、哲人、社会庸民之区分，大体有乐观、超然观、悲观三种。宗白华既反对悲观自残派与消极纵乐派，又反对旷达无为派，他提倡一种“超世入世之派”，认为人应当有所作为，心怀天下，对人对世负有责任，救众生而以为未尝救众生，功成而不居，进谋世界之福，“无可而无可，无为而无不为”，此乃世界圣哲所共称也。宗白华首先将这一思想运用到了少年中国会的建设上，体现了对培养新青年小己新人格的殷切希望。他试图通过先建立一个精英团体——思想高尚，精神坚强，宗旨正大光明，行为稳健，然后再向外扩张，改造整个旧社会，这一主张可以说与一些当代政治哲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

“总而言之，我们不像现在欧洲的社会党，用武力暴动去同旧社会宣战。我们情愿让他们，逃到了深山狂野的地方，另自安炉起灶，造个新社会，然后发大悲心，再去救援旧社会，使他们也享同等的幸福。”在宗白华看来，武力暴动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实质，只有从人性的根部启蒙民众，通过情感传染的方式来改造国民性，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人类整体的解放，这是建立在一种普遍人性情感基础上的变革路径。这一超己思想明显地来自对歌德普遍人性论思想的吸收，宗白华从青年时代起就极为喜欢歌德，他当时的座右铭就是“拿叔本华的眼睛看世界，拿歌德的精神做人”，宗白华的生命美学思想无疑充分实践了这一座右铭。但宗白华又对歌德思想做了创新，歌德有一句诗说：“人类最高的幸福就是人类的人格”，而宗白华补充道

《宗白华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05页。

同上，第204页。

同上，第36页。

“人类的幸福在于时时创造更高的人格”，他将歌德的普遍人性论运用于动态的社会现实之中，他认为要想在残酷、自利的黑暗现实社会之中生存发展下去，只有先从培养小己新人格开始，再向着“超人”的境界做去，共谋人类同情心的涵养与发展，因为“同情”是社会结合的原始与社会协作的原动力，同时是社会向前进步的轨道，是小己解放，迈向超己的第一步。因此，宗白华强调处于社会中的个体，应为人生向上发展计，为社会幸福进化计，加强团结。否则，同情消灭，社会也将解体。这也就不难理解宗白华的救世思想了，它追求的是超越个体之上的和谐，中西个体解放路线的根本不同之处即在于一是强调社会的人，一是强调个体的人，如若单纯强调个人的自由解放，那么它将导致另一场暴乱。

二、同情与忏悔：宗白华早期伦理哲学的核心范畴

1921年1月，宗白华发表于《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的《艺术生活——艺术生活与同情》一文，首次明确而系统地论述了艺术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他饱含激情地感慨道：

诸君！我们这个世界，本是一个物质的世界，本是一个冷酷的世界。你看，大宇长宙的中间何等黑暗呀！何等森寒呀！但是，它能进化、能活动、能创造，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它有“光”，因为他有“热”。

诸君！我们这个人生，本是一个机械的人生，本是一个自利的人生。你看，社会民族中间何等黑暗呀！何等森寒呀！但是，他也能进

化、能活动、能创造，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它有“情”，因为它有“同情”。

在这里宗白华将社会人生中的“情”等同于宇宙间的“光”与“热”，虽然在广袤的宇宙中，我们的社会民族中存在着诸多黑暗，但人类自身所具有的“同情”力可以使我们的社会进化，它是人类向着美好未来发展的原动力。“同情”来自宗白华对西方“sympathy”的翻译，为了更好地理解“同情”的内涵，我们有必要将它与“移情”这一美学范畴加以比较。不同于“移情”偏重于将客体对象融入自己的主观情绪之中，“同情”更强调发生对象主客体之间的平等交流与对话。“移情”具有静止性，是主体对客体的主导，它强调在内在想象中主体情感的释放，体现了在现实之外还有一个想象的空间，是一种单纯的审美快感；而“同情”导向一种伦理价值的维度，它侧重关注对象的感受，是一种导向他者的想象，强调主体间在交流中所引发的一种促进事物对象发展的结果，“同情”具有互动性、目的性。宗白华的“同情”说，从主体来看，它是一种理性的情感，主体可以正确认识他人的情绪意志，然后人们根据这种认识指导自己的行为。这是一种可以培养的情感能力，它是建设新人格，促进社会人生向艺术化方向发展的引擎。

在宗白华看来，“同情”是凝聚各种社会力量的重要媒介，因为“全宇宙就是一个大同情的社会组织，什么星呀，月呀，云呀，水呀，禽兽呀，草木呀，都是一个同情社会中的眷属”。包括自然在内，每一个个体都是富有生命意志、充满精神情绪的独立体，存在着普遍的共同感。因此，我们可

《宗白华全集》第1卷，第316页。

同上，第319页。

以依着这种美好的情感“将这个宝爱的自然，宝爱的人生，由自己的能力再实现一遍”。宗白华的这种唯情感意志论，早期受到叔本华哲学的影响，是对机械宇宙观的批判。他首先摄入了叔本华关于人的意志与欲望的学说，叔本华认为：“思想而外，尚有存者，即感情意志是也，此喜、怒、悲欢、恐惧、希望，恶嫉等情，既无外物，亦非思想，与生俱生，万物俱备，总名之曰：意志。”但宗白华认为依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人生观，人类自然不得不悲。因为一切意志，唯是求生。但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虽然可以暂时停止，却不能永远地熄灭。叔本华的意志论是对单纯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超越，但是他的人性出发点是人的自然属性之恶的本性。这是由于他认为人的行动之因有三：自利、害他、同情，面对无休止的欲望的满足，除了人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属性之外，叔本华认为人还有第三种能力，即同情。所谓“同情”，首先是爱的能力，能够感别人之感。因此针对人的自然属性，叔本华提出了更高的社会属性，但在这里，叔本华还仅限于以人的“同情”之力来摆脱个人痛苦的解放，走向的终点是悲观的人生观。宗白华从中总结了叔本华伦理观的最高目的要旨，一是要消灭人的意志，二是实现博爱大悲，三是公正不害。从宗白华早期的“同情”观来看，实现后两个伦理目标并不需要依叔本华所说消灭人的意志，因为所有的个体都处于充溢着生命情绪的宇宙之中，宗白华希望“依诸真实之科学，建立一切真实之宇宙观，统一一切学术。依此真实之宇宙观，建立一真实之人生观，以决定人

生行为之标准”。通过科学学理的熏陶，富含激情的真理探索，以及艺术的生活，那么便有助于我们建立新的人生观，促进现世社会向上发展。

如果说早期宗白华以“同情”为核心的伦理哲学观建基在普遍人性基础上，那么与郭沫若的结识便使得“同情”观的内涵更加丰富。宗白华关于培养个体情感能力的强调，不再是单纯的设想，而是开始有意识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结合起来，分析中国人的特性，寻找建设新人格、新文化的路径。正如他所说，早期多在“概念世界”中分析康德哲学，受叔本华哲学意志论的影响，相信无限之同情可以使个体消灭自私的恶的本性，在意志中，但觉宇宙一体，将不伤一生，不害一物，达到公正仁爱的美好境界。在与郭沫若、田汉两人通信中，他提出一种“忏悔性人格”，指出对宇宙万物的同情，对存在过失的人生进行诚实的忏悔，这都是为着建立健全的人格，“人之不成，诗于何有？”那么，人之不成，国于何有？郭沫若是一个泛神论者，他的诗作有一种自然的清芬，宗白华认为，《学灯》栏正需要这种清芬给社会输入新鲜的血液，称他与田汉是“东方未来的诗人”。而郭沫若由于婚姻的问题，却认为自己是罪恶的精髓，不配有宗白华的如此重视，于是在书信交流中，他向田汉、宗白华倾诉自己的罪恶。“我的过去若不全盘吐泻净尽，我的将来终究是被一团阴影裹着，莫有开展的希望。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靈魂终究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宗白华与田汉认为忏悔是健全人格的前提，人本身就是

《宗白华全集》第1卷，第6页。

同上，第17页。

同上，第236页。

理智与情感、灵与肉的矛盾体，而人性并不会因缺点、矛盾的存在而无法完满，它只是砥砺我们人格向上的创造罢了，但很少有人能够敢于正视这种矛盾性，并对自身的罪恶进行公开的忏悔。田汉更是直接指出：“一个人总是在Good and Evil中间交战的。战得胜罪恶的便为君子，便算是个人；战不胜罪恶的人，便为小人，便算是个兽！人禽关头，只争毫发，是不容有中性的！所以一个人的一生，若以线形表之，只是波线，朝而君子，便是登山‘ ’；夕而小人，便是落谷‘ ’；绝少能一直线到底的。人要建设自己的人格，便要‘力争上流’，便是要力由深谷攀登高山之巅。安于深谷的是‘罪恶的精髓’；想要努必死之力以攀登高山的，是‘忏悔的人格’。世间天成的人格者很少，所以‘忏悔的人格者’乃为可贵。”作为忏悔的主体，我们应有勇气面对真实的自己，作为倾听者，要以此为戒，检视自己的行为，宽容地对待他人的罪恶，因为，人类都是有过的，无论任何人，只要他发了一个“更生”自己的宏愿，造物主是不能不答应他的。“诸君！艺术的生活就是同情的生活呀！无限的同情对于自然，无限的同情对于人生，无限的同情对于星天云月，鸟语泉鸣，无限的同情对于死生离合，喜笑悲啼。这就是艺术感觉的发生，这也是艺术创造的目的！”然而他们认为在中国当下，很少有敢于公开忏悔自身缺陷的，更不用说对于社会现状的公开反思了，它暗示着新道德的建设还有许多曲折，一言以蔽之，现在的社会是一种“衣冠文明”。

三、新精神和新生命：宗白华伦理哲学的实现目标

宗白华认为，“同情”力有助于国民新人生观养成，中国旧式平民一般大致还无人生观可言，因此一种理性情感能力的培养是必须的，它可以形成人们反思、想象他者的能力。“同情”的张力强调服从真理，破除偏见，以一种科学的认识来思考黑暗社会现实产生的原因，明确我们的人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每一个个体都是属于社会大同情组织的。这样，我们才能从理性的角度决定人生行为的标准，作出有意义的选择。另一方面，“同情”还可以唤醒我们内心的良善，使人类成为活生生的人，而不仅是机械的、无情感的、物质的生物体。这就要求我们要从艺术的观察上推察人的行为方向。我们应像艺术家的创造过程一样，积极地把我们人生的生活，像艺术品那样循着优美高尚的目标去创造。同样，我们的人生也应像艺术品那样协和、整饬、优美、一致。以唯美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上社会上的各种现象，无论是美的、丑的、可恶的、龌龊的、伟丽的自然生活，以及鄙俗的社会生活。如果我们都以一种同情的眼光对待之，那么心中就会得到一种安慰与宁静，一种精神界的娱乐，使我们作为小己的哀乐、烦闷的负面情绪减少，渐渐得到一种超小己的艺术人生观。这种艺术人生观把“人生生活”当作一种“艺术”看待，使烦闷的世俗人生优美、丰富、有条理、有意义，从而培养高尚社会人民的人格。一旦我们以艺术的眼光，平等对待人生中的各种情境，那么我们便可平心静气，用研究的眼光，客观分析事情的原委、因果和真相，这会使事件避免向不良的方向发展。因

《宗白华全集》第1卷，第243页。

同上，第179页。

此，同情不仅可以提高人们的感受力，还具有理性批判的精神，它是帮助国民形成艺术人生观的核心内核，然后人们便可以根据这种人生观指导自己的行为标准。

宗白华认为，可爱的中国不在过去，不在现在，而在未来，因此它的可爱之处就在于现在的中国还有与我们创造新中国的机会，可恐怕现在中国人的爱国心，实在是有许多完全出于无意识的盲从，或出于狭隘的国家主义，真正出于了解爱国真谛的很少。对国民“同情”力的培养可以帮助民众形成对国家，对民族的爱，使人们以小己之力感受到社会整体的力量，并积极地投入于生命的波浪、世界的潮流之中。由于中国的家庭主义观念至上，“中国人向来只晓得有个人与家庭，不晓得有社会，对于社会的责任心非常淡薄，社会上的事漠不关心，好像另是一个世界。否则把社会看做敌国，不是高蹈远隐不相闻问，或冷眼旁观妄肆讥评，就是怀挟野心，争图权利，攘夺些财产，回到家中，围着妻子儿女过他团圆快乐的家庭生活，全不讲求社会上共同的娱乐与共同的利益”。然而“这种心习最不宜现代潮流，尤不适合共和政体，因为个人主义与家庭主义盛了，社会上政治上的责任心自然就冷淡了。我们若不能战胜自己的恶习，断不能战胜社会的黑潮流”。因此我们需要精神能量的补给与填充，“美化”国民的感情。在这里“美化”大略可相当于“净化”，宗白华希望保持人性的纯洁性与美好，培养国民的大情怀精神。西

方当代政治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曾提出文学想象可以作为建构人类“同情”力的德性伦理媒介，宗白华提出了相应的观点，他认为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生活可以丰富我们的生命，融社会的感情情绪于一致，因为“一段人生，一幅自然，各人遇之，因地位关系之差别，感觉情绪，毫不相同。但是，这一段人生，若是描写于小说之中，弹奏于音乐之力，这一幅自然，若是绘画于图册之上，歌咏于情词之中，则必引起全社会的注意与同感”。

那么“我们根据这种同情，觉着全社会人类都是同等，都是一样的情感嗜好，爱恶悲乐。同我之所以为‘我’，没有什么大分别”。于是，“人我之界不严，有时以他人之喜为喜，以他人之悲为悲。看见他人的痛苦，如同深受。这时候，小我的范围解放，入于社会大我之圈，和全人类的情绪感觉一致颤动，古来的宗教家如释迦、耶稣，一生都在这个境界中”。但是，宗白华认为，我们仍要继续前进，用我们的余力，帮助全世界的人都臻此境，再发展人类文化的进步，以至于无疆无休。

宗白华认为，我们人类生活本来就是奋斗与创造，我们一天不奋斗就要被环境的势力所压迫，归于天演淘汰，不能生存；我们一天不创造，就要生机停滞，不能适应环境潮流，无从进化。宗白华把不奋斗不创造的这类人看作是寄生虫与害虫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大敌，世界上所有种种战争，现在所有种种社会革命，人类开化以来所有种种罪恶与痛苦，就是为着人类社会上有这种寄

《宗白华全集》第1卷，第94页。

同上。

同上，第318页。

同上。

同上。

生生活而起。宗白华更是强调，中国社会上寄生生活之多，恐怕要算世界第一。所以，通过培养国民的“同情”力和“忏悔”精神，让过着寄生虫与害虫生活的人认识到自身所犯下的罪恶，然后转为培养自身奋斗与创造的行动力。宗白华认为，如果世界上人人都过他正当的奋斗与创造的生活，没有寄生生活的存在，世界就会永久和平。所以他强调，改良社会现状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每个人都过他正当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而要达到这个目的，自然就从青年做起。他号召青年行动起来，培养自身的奋斗目的，创造自身的生活。宗白华认为，中国青年应培养两种奋斗目的：对于自身遗传恶习的奋斗和对于社会黑暗势力的奋斗，这两种奋斗目的与培养新人生观和培育爱国心的目标是一致的，通过培养“同情”力和“忏悔”精神同自身狭隘的精神恶习作斗争，同社会黑暗陋习作斗争，为自己造光明，为社会造光明。同时，宗白华也强调青年应积极行动起来创造两种事业：对于小己新人格的创造和对于中国新文化的创造，这说明宗白华认为对于奋斗目的的培养，对于新人生观和爱国心的培育，都应该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来，只有行动起来才能创造新生活、新社会。对于小己新人格的创造，宗白华认为要先在自然界中养成强健坚固的人格，才不会根基不稳，才能面对社会上黑暗势力，才能进入

社会中去奋斗，才不致堕落。对于中国新文化的创造，他语重心长地提醒青年人，凡事须主动研究，不要趋于被动盲目的地步。所以，宗白华强调的是积极主动地行动起来去奋斗去创造，创建一个雄健文明的“少年中国”，创造一种新生命、新精神，不是旧中国的消极懒惰，也不是旧欧洲的暴力侵略，是发展自体一切天赋，活动进化，适应新世界新文化的“少年中国精神”。

综上所述，宗白华以“同情”为核心范畴的伦理哲学观，致力于建设新人格，实现非暴力变革社会的政治理想。与西方建立在自身人性、人权优越性之上的“同情”观不同，宗白华立足于全人类，提出一种建基于普遍人性基础之上的，谋同情心共同发展的人类目标。从早期对人性的哲学考察至中国“忏悔人格”的研究，宗白华逐渐接触到现象的内部，不再是单纯的设想，而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映射相结合，分析中国人的特点，来寻找建设新人格、新文化的路径，他自己也声称：将来的结果，想做一个小小的“文化批评家”，细细研究中西文化，探寻出东方文化的基础与实在，然后再切实批评，以寻出新文化建设的真路来。中国旧文化中具有的伟大优美万不可消灭，宗白华携带着这一现实目标，向着他的生命艺术哲学出发。

责任编辑：沈洁

pictures. This sort of sight is materialized, mediated and visualized, repeating the destiny that spatial production is dominated by political events again. The uniqu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Jiangwan-Wujiaochang region both integrate into the risk of getting lost in consumerism space lacking genius loci and following the same pattern.

Cultural Memory Constructed, Forgotten and Reconstructed: A Discussion Centered on “Kang-Wang Building a Castle” Narrative

Bi Xuling

Abstract: It is a cyclical process that cultural memory is constructed, forgotten and reconstructed. Cultural memor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functional memory and storage memory. Functional memory is the current memory selected from cultural memory for an immediate cultural construction. However, some cultural memory information without realistic value is forgotten or lies dormant, thus changing into storage memory. The cultural memory information into the storage memory will be awakened and reconstructed at some time in the future. Shanghai’s legend—“Kang-Wang building a castle”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being constructed to forgotten to reconstructed, marked fully with self-adjustment and adaptation to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situation of lo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eamrollers i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Thoughts in Shanghai Culture

Yao Quanxing

Abstract: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thoughts in modern Shanghai culture promote the advocacy and practic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culture. Many important contributors at that time should be paid full attention and sung high praise, and their thoughts should also be enhanced and carried forward.

The Dissenting Voice in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The Case of Wu Mi’s Reception of Milton

Hao Tianhu

Abstract: John Milton functions as a cornerstone for Wu Mi’s (1894-1978) mansion of cultural humanism. This is demonstrated in Wu’s reading, inspiration (by), citation, translation, imitation, rewriting, comparison, evaluation, teaching, and spread of Milton, and also the critical dialogue between Wu and Gu Hongming concerning Milton. If Gu Hongming is a pioneer in Sino-Western comparative culture, Wu Mi lays a foundation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Milton is a sharp weapon for Wu Mi’s critique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Zong Baihua’s Early Ethical Philosophy: Sympathy and Repent

Wang Bingbing, Wen Xuewu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criticism field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ethical philosophy, “sympathy” is proposed frequently as a keyword of constructing poetic justice society. The aesthetics thinker—Zong Baihua has paid attention to “sympathy” in the period of May Fourth Movement. “Sympathy” is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Zong Baihua’s salvation mode and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his life art philosophy. He believes firmly that it could realize the equal dialogue of people and solidarity power for good by cultivating people’s sympathy. And then the salvation goals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could be achieved. The paper expounds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origin, connotation and

secular meaning of ethical aesthetics of the “sympathy” of Zong Baihua. Zong Baihua’s ethical philosophy is the foundation of his art philosophy throughout his entire lif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Liu Xie’s “Wen Xin” and “Stylistics”

Zhang Guo’an

Abstract: *Wen Xin Diao Long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written by Liu Xie is a research into different styles with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stylistic”. The core idea of his stylistics is “dynamic integrated harmony”. On the visual threshold of modern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the essence of “Style dissolution” lies in the contemporary article unrestrained as the aesthetic space of formalism that breaks from the reality and holonomic world order, corresponding to aesthetic perception、recreation、subjective spirit of entertainment and unilateral subject cognition of human beings. It means that the continuity and integrity are constituted by “astronomy-Man’s literary” sympathia interpenetration and naturally continues’ cultural space order, both of which have been disintegrated, driving from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article. Literary activities have lost the “natural law-enthics-disposition” as life run-through and harmony in organic world. People nowadays regard “the stylistics” as a sign of self-consciousness of ultra-utilitarian aestheticism literary in China , which perhaps has strayed far way from it.

（上接第058页）

理科学的方法去思考和研究城市。作为五角场新地标的万达广场，商场+影院+娱乐会所，上面是几栋住宅，这种模式就居住的便利性、环境等诸要素看，都不符合好住宅的标准，它的走俏即在于成功地标志为政府的形象，成为城市综合体的一种。同样，创智天地大量的SOHO建筑也是靠外形美制造流行符号取胜。问题是，视觉消费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昂贵之外还可以大量复制，“写字楼已经过剩，小资们装B之后，只剩懊恼”。万达的城市综合体同样被抄袭被过剩。当一座单体建筑变成一座城市，城市也模仿建筑那是否必须膨大到巨无霸，吸纳尽整个国家或其他地区的血液营养？

20世纪90年代后根源于政治制度下的国家垄断资本，在人口过剩的条件下选择了保就业维护经济的高增长率的模式，而地方财政出于资本渴求，不得不大搞土地财政，在这种政策主导下，城市

化、房地产、跨国资本和大众媒体结合起来，打造了中国的资本主导空间生产、扩张的独特景观。这种政策主导型、依托高增长率的急速城市化，已经造成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资源的破坏，而一旦既已存在的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危机爆发，势必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如社会自组织的丧失和自治支点的破坏、历史和文化多样性的式微。无论是在物质地理还是在媒介地理中建构的“城市—家园”，同样是一个在城市和乡村都助长了社会区隔，权力、资源更加集中化，也使乡村与城市更加不平等且再生产不平等的空间景观，它期望满足大众对高房价下对家园的渴望和向往，但因与现实的分割反而加重了大众失去家园、“无地可在”的焦虑与恐惧。

责任编辑：李艳丽

《网传即将破产15位中国巨富》，参见“上海热线”，<http://life.online.sh.cn>，2016-01-08。